

人世间

火红的玫瑰

张凤英

爱的回声

王伟炜

那年腊月，是父亲和母亲结婚五十周年的日子。晚上，我们七个儿女挤在父母那间不大的客厅里，为他们办了一场小小的烛光晚会。灯关了，蜡烛点起来，光影在母亲满是皱纹的脸上轻轻晃动。

大家正说笑着，父亲忽然站起来说：“你们等会儿，我下楼拿样东西给你妈。”说完就推门往楼下走，楼道里传来他缓慢又有些着急的脚步声——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不一会儿，门开了，父亲怀里竟捧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花！原来，他早把花藏在楼下的自行车棚里。

小弟机灵，赶紧打开了音响，那支熟悉的《婚礼进行曲》便慢慢地流淌出

来。我们都笑了，看着老父亲有些笨拙地走到母亲面前，接着——我们都愣住了——他竟学着年轻人的样子，单膝跪了下来。“孩子他妈！”他把花举高了些，声音有点发颤，“五十年了……庆祝咱们白头到老。”

我们使劲鼓掌，妹妹们眼里已经泛起了泪光。可母亲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接过花，更没有笑。她怔怔地看着那束红得像火一样的玫瑰，看着跪在眼前的父亲，突然用手捂住了脸。她哭了，起初是压抑的抽泣，肩膀一耸一耸的；后来哭声越来越大，变成了一种我们从未听过的、近乎嚎啕的痛哭。弟弟妹妹面面相觑，不明白这该高兴的日子，母亲为何哭得这样伤心。

我懂，我是长女，这些年来母亲的苦和泪，我都看在眼里。母亲嫁给父亲时，刚解放不久。街上贴满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标语，许多和她年纪相仿的姑娘都剪了短发，走出家门工作去了。母亲从小爱唱爱跳，嗓子也好，便考进了铁路文工团。那是她最快活的一段日子——排练、演出、跟着队伍去各个站段慰问。

可父亲不高兴。他是旧式家庭出来的男人，觉得妻子整天和别的男人一起排练，不成体统。两人开始吵架，一次比一次凶。最厉害的那回，父亲喝了酒，冲到文工团的排练室，手里攥着个瓶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喊：“回家！不然咱俩一块儿死！”后来母亲说，瓶子里装的是农药。她怕了，真的怕了。第二天就去办了离职手续。

从此，母亲成了家庭妇女。她的舞台从排练厅换成了厨房，演出服换成了围裙。有时候做完家务，她会坐在窗前发呆，哼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调子。那歌声悠悠的、凉凉的，听着听着，我的鼻子就酸了。扭头看母亲，她眼里也噙着泪，却还继续哼着。我那时还小，只会走过去，用小手摸她乌黑的头发——那么厚、那么亮的头发。父亲若是在家，便会默默泡一杯茶放在她

手边，挨着她坐下，半晌不说一句话。

日子一天天过，父亲的脾气竟慢慢变好了。尤其是老了以后，他对母亲的照顾，仔细到让我们做儿女的都惭愧。每天清早，他推着自行车让母亲扶着车后座，两人一步一步挪去公园。回来时车筐里装着菜，父亲便系上围裙煮粥、煎蛋。母亲小脑萎缩后，手抖得拿不住筷子，父亲就一勺一勺喂她。每星期他固定给母亲洗澡，搓背、洗头、擦干，再换上一身干净衣裳。我们想帮忙，他总摆手：“你们忙你们的，我这辈子欠你妈的，得还。”

直到父亲自己病倒，我们才知道他得了绝症。他坚决不肯动手术，说：“钱留给你妈，我没退休金。”父亲渐渐瘦得脱了形，却还一次次告诉我们：“我七十八，够本了。只一件事——我走后，你们照顾好她。”我们都哭了，一个个向他保证：会按月给母亲生活费，轮流接她住，按时带她体检、吃药……

有一回，母亲去弟弟家看新出生的曾孙，医院里只剩下我陪父亲。午后阳光照进病房，他忽然轻声说：“那年我去文工团……瓶里装的不是农药，是土炸药。”父亲眼睛望着天花板，“我当时想，要是她真不跟我走，就一起死了算了。”

我也快七十八了……”像和父亲约好似的，后来，母亲也是七十八走了。走的那天，她像是睡着了，神情很安详。

如今想起他们，总想起那束火红的玫瑰，烛光映着两张满是皱纹的脸。他们的爱情，不像如今电视里演的那般光鲜顺遂，里头有逼迫、有眼泪、有长达几十年的隐痛与补偿。可奇怪的是，正是这些苦涩的、甚至带着伤疤的岁月，让这份感情变得那么重、那么深，重到要用一辈子去偿还，深到似乎约好了在七十八岁去另一世界。

人人都说这是一个奇迹，偶然的奇迹后面一定有它的必然，我想那是爱的回声、善的报答。

2014年4月10日，我应邀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22期中青年作家班山东老乡的聚会。山东作家王月鹏在餐馆门口等我们，他问我：“你是烟台人？”“我父母都是烟台人。”“烟台哪的？”“烟台海阳。”他若有所思地又追问了一句：“你多大了？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他又认真地问了一句：“你还有一个妹妹吧？”我真是惊讶了，回答说：“是啊！”他非常肯定地说：“那就对了，你爸是我二爷爷！我

家里存着二爷爷寄回来的你们的全家福。我小时候和二爷爷通过几年的信，二爷爷在信中一直鼓励我好好学习！”瞬间，我惊呆了！同学们目瞪口呆地望着这戏剧性的一幕，随着他的诉说，记忆的碎片慢慢地形成一根完整的链条。

王月鹏所说的二爷爷就是我父亲。我父亲王忠亭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忠厚村，1947年6月，父亲加入了华东野战军，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随部队一路到了福建，最后一个部门是明溪县法院。1990年父亲去世后，我们就搬了家。辗转中，与山东老家失去了联系，算起来，已整整24年了！

鲁迅文学院被称为“文学黄埔”“作家摇篮”。鲁院第22期高研班的同学是从全国选出来的50名作家。这样的机会本身就极其珍贵与难得；而失联24年的姑侄俩，竟然出现在同一期作家班上，更属奇缘。我父亲有兄弟三人，王月鹏的爷爷是哥哥。按辈分，王月鹏得喊我姑姑。同学们说，我们的重逢，从数学概率上计算，比买彩票中大奖还难。

王月鹏说他和家人一直对我父亲很感恩，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联系我们。原来，上世纪70年代，远在山东老家的奶奶因病瘫痪在床，父亲省吃俭用，按月寄钱回家供养奶奶。当时，王月鹏一家和奶奶一起生活，我父亲也供着他的生活学习费用，经常写信告诉他要好好上学，努力考上大学。王月鹏读小学时，开始与我父亲通信，一直到父亲去世那一年。

远方的二爷爷曾经给那个在贫困中挣扎向上的少年无限关爱与鼓励，王月鹏珍藏着那些信件，也珍藏着那份深爱。

我出生在福建三明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明溪。我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口音腔调完全南方化。小时候，父亲就告诉我，我们是山东人，我们老家在山东海阳忠

厚村。父亲是用山东腔告诉我这些的，他一生都保持着浓郁的山东腔调。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人在外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他在家乡的时间，乡音却始终难以改变。他也始终保持着山东的饮食习惯，喜欢吃包子水饺。那个年代，物资很紧张，买什么都得凭供应票。每年山东老家寄来的红彤彤的大苹果和饱满的花生仁是很难得的美味。儿时记忆里，苹果花生就是山东的代名词，苹果的脆甜、炸花生的清香就是家乡的味道。

每年新茶上市的时候，父亲要买许多的茶叶，一包两斤分开，再用缝纫机缝好一些白色的棉布袋子。在袋子上，他一笔一画地写上山东老家亲人们的地址与名字，一边写一边念叨：“这是给你爸爸的，这是给你姑姑的，还有姨姨的和舅舅们的，每家都有，每家分量都一样。”

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他首先把给奶奶的生活费留出来寄回去。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宽裕，无论生活有多艰难，他都没有忘记那块土地有自己的亲人，没有忘记对老人的赡养与孝顺。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亲情与爱却是那样丰盈充沛，滋养着人们的心灵。

父亲为人谦恭善良、质朴宽厚。他热爱、他敬仰的革命事业，使他把这份爱化作热忱投入到他的工作中。他对事业的忠诚也表现在他对职业操守的坚持。父亲曾任法院院长时，从不收礼，他说，白天不收昧心钱，一夜才有好觉睡；一生不做亏心事，才有一世的良心安。父亲为人谦和，从不与人争是非，他常说，饱满的稻穗总是低垂的，真正有学问的人总是谦逊的。

2014年3月，我和王月鹏分别

由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与山东省作家协会推荐，来到了鲁院。那飘散了二十四年的血脉的丝线终于续上了。彼时，春风和煦，阳光正暖，满院的玉兰灼灼怒放！

冥冥之中，我们的相遇或许是怀有慈悲之心的父亲生前种下的爱的树苗，经过二十四年发芽、生长、开花，在鲁院这块福地结出了善果。

生活在继续，家风在传承，爱的花朵开在我们前行的路上。